

捻军在长葛的活动

张佐军

以张乐行、龚得树为首的安徽捻军，于1852年（清咸丰二年），以亳州雒河集（今安徽涡阳县）为基地，进行武装抗清起义。之后，河南永城捻军苏添福部、夏邑捻军王贯三部与张乐行、龚得树联合作战。1855年，捻军四大支，即张乐行部、苏添福部、龚得树部、王贯三部已形成。至同年8月，各路捻军领袖齐集雒河集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大汉国”，公推张乐行为“大汉盟主”。同时决定捻军编制采“五旗军制”：张乐行以盟主兼黄旗总目，苏添福为黑旗总目，龚得树为白旗总目，王贯三为另支黑旗总目，侯士伟为红旗总目。另外有五种镶边旗捻军，分别以龙邓鹅、万苍龙、孙葵心、姜太林、李成等为首领。

雒河集会议后，九、十月间，张乐行、苏添福等开始率大军围攻亳州，并分军攻略河南夏邑、鹿邑、归德各地，从此，安徽捻军展开了向河南各地的进军，直到1868年8月西路捻军失败时止，十四年中，其足迹几乎踏遍河南全省百余州县。

1858年5月至1861年12月，孙葵心、姜太林等部捻军以颍州（今安徽阜阳）为中心，担负远征河南任务，先后多次活动于豫东和豫南各地，并六次到长葛。

①1859年（清咸丰九年）10月，孙葵心、刘狗等部征河南。4日围夏邑，19日围睢州，击败河北镇总兵承惠部。22、23日连攻杞县城，不克，入兰仪。开封戒严。巡抚瑛启令前河北镇总兵崇安围剿捻军，捻军由通许折入尉氏、洧川、长葛、新郑、禹州等地。26日捻军至长葛，半夜攻城西门，知县顾恩培顽守，县城未被攻破。27日，捻军在县东县西各乡镇活动。是年11月5日，11月26日，孙葵心、姜太林部又两次复至长葛活动。

②1860年4月14日，捻军将领刘狗率骑、步兵数万人进入长葛，在县西部活动。

③1861年2日，姜太林部由归德围宁陵，攻通许，复进向开封。因省城防守转严，转向尉氏、洧川、新郑，复折而南入许州境。3月11日，攻长葛县城。不克，入许州、临颖、襄城、叶县。

④1861年9月22日，刘狗等部捻军攻郑州城，连续三日，被穆正春等部清军击退后，捻军分兵三路撤军。一路由中牟东走。一路经通许、扶沟、太康回亳州。另一路由新郑到长葛，后经洧川、尉氏、鄢陵、扶沟、鹿邑回亳州。

1864年7月，太平天国首都被清军攻陷，太平军与捻军结合。以遵王赖文光、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荆王牛宏升、魏王李蕴泰为领导人，重新整编全军，使之成为以捻军为主力的一支正规化大军。12月，张宗禹、赖文光、陈大喜等自湖北东部折回河南，进达湖北襄阳至河南邓州间，与清军战于邓州、南阳、南召、鲁山、汝阳、叶县等地。尔后，张宗禹、赖文光等部捻军对河南展开了进攻，几乎踏遍黄河以南豫省全境，使河南统治阶级在军事上、政治上和财政上都陷入困难之境。当时，豫抚吴昌寿报向清廷的奏折中，痛陈攻捻军事有九难，最后言道：“以难战之兵，难筹之饷，当难制之寇，而又处难以自存之地。”

自1865年下半年至1866年底，张宗禹、赖文光等部捻军曾五次到长葛活动。

①1865年7月下旬，捻军张宗禹等部乘各路清军入皖之机，经商丘，攻柘城。清军蒋希夷、张曜等部赶至，捻军解围走西南，经太康入睢州境，复走西华、扶沟、鄢陵、通许、尉氏，由洧川进入长葛活动，后由长葛进入许州、临颍。

②1865年10月上旬至中旬，张宗禹攻南阳不克，在清军张曜、宋庆等部逼攻下，由裕州（今方城）入鲁山、宝丰境。18日，张宗禹在宝丰石桥遭到清军宋庆部截击，由郟县走禹州、密县、新郑。后由新郑进至长葛，经长葛走鄢陵、扶沟。

③1866年8月4日，赖文光等部捻军在太康与淮军潘鼎新等部接触后，于5日渡过贾鲁河，经由新郑、密县、禹州进入长葛，在长葛活动后进入许州、襄城境，复进往舞阳、叶县一带。

8月下旬，张宗禹、牛宏升等部捻军与清军宋庆、湘军皖南镇总兵刘松山等部战于新野、邓州境。大创清军后，北上南召、鲁山、宝丰，31日进入长葛。曾国藩命刘铭传、潘鼎新等军由中牟、尉氏赶去迎击，截断捻军东进之路。

④1866年9月12日至15日，张宗禹部捻军复到长葛活动。

（作者张佐军：长葛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干部、1991年版《长葛县志》副主编）

中原大战中的长葛战事

郑大历史系教授 蒋相炎

1930年5月，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始。9月中旬前，长葛为冯军后方，饱受差役之苦；9月中旬后，战事推进到长葛，又惨遭战火之害。蒋冯两军在长葛交战20天，终以冯军败北而结束。

9月初，蒋军开始总反攻，由夏斗寅的13师、陈诚的11师临时组编为第二纵队（总指挥夏斗寅），9月中旬，由周口经西华、鄢陵，抵许（昌）长（葛）边界，13日，陈诚的11师占领石象。当时，退至长葛境的冯军主要有两支：一为张维玺部，部署在许长边界，控制和尚桥、苏桥；一为任应岐部，部署在县城及其以东地区。另有吉鸿昌部，退守洧川，布防长洧边。14日，蒋军二纵队继续北进，11师先后占领董家集（董村）、白雾寨、鲁湾等地，隔断了长洧间的联系。13师占据了洧川以南五里纸坊至南席一带，并准备继续向北推进。

9月16日，张维玺、任应岐等部发动反击，激战一周，蒋军攻势暂被遏止。

为了加强攻势，蒋介石又调顾祝同的第8纵队（辖第2、3、23三个师），从考城增援长葛。23日，8纵进至长洧边，准备攻占官亭。24日官亭之战开始。拂晓，各师由驻地西进，18时，2师4旅9团攻入官亭车站，并将铁路破坏，21时，冯军兵车一列，满载张维玺部一个团由南而来，进站出轨。此时，战斗在站内展开。25日3时，冯军团受创过重，遗尸200余具，全部南返。官亭车站及其以东地区被蒋军控制，京汉铁路交通被切断。8纵指挥部移驻岚川府。长葛战局相对稳定后，蒋介石于27日中午亲至11师师部驻地石象镇。他这次石象之行有其特殊任务，主要是收编驻洧川的吉鸿昌部。

当时，冯军失败已成定局，吉鸿昌为保留一支武装待机再起，派副官王慈博同陈诚联系，商议收编事宜。蒋介石到石象后，电召河南省代主席张钫携款47万元，在王慈博的陪同下，化名郭海峰，以吉鸿昌同乡的名义到了洧川，在城东五里的一座庙内，会见了吉鸿昌。经两个小时的谈判，商定吉鸿昌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2路军，军内序列不变，官兵编制不变，吉鸿

昌任 22 路军总指挥。当晚张钫返回石象。30 日，陈诚的 11 师由长葛进驻洧川。

在石象，蒋介石于 30 日 10 时，还发布了作战令。全文如下：

一、我军昨夜占领开封、杞县、尉洧一带，敌前线总退却，已跟踪追击。

二、已领六纵向汜水前进，截击残敌。五纵已占领彭婆镇，现已猛攻龙门、洛阳。

三、第一纵队着即经许昌以南及禹县、登封向洛阳前进，截击西窜之敌，期在洛阳以东悉数捕获歼灭之。

四、予现在 11 师师部，明晨回柳河。

中正

10 月 1 日，长葛冯军开始撤退。当天，任应岐部由县城西撤。傍晚，夏斗寅的 13 师入城。2 日，官亭外围的张维玺军北撤新郑，顾祝同的 8 纵追击北进。13 师万耀煌旅亦由县城西进，先后占据和尚桥、苏桥、杜村寺等地。中原大战在长葛的战事至此停止。

中原大战蒋介石兵陈石象纪略

王云农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就任中华民国总司令职，并通电反蒋，冯玉祥、李宗仁在潼关、桂平各就副司令职。4月23日，冯玉祥以副司令名义，颁布命令，向蒋介石军队作战。4月30日，蒋、阎、冯、李中原大战之前哨战在杨山开始。5月1日，蒋介石发表讨伐阎、冯誓师词，11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调三个方面军，分头迎击阎、冯、李部。蒋军陈诚所率11师自鲁西沿陇海线西进。6月下旬，驻进石象，指挥部设在石象小学校内。与驻守和尚桥的冯军对峙。

陈诚至石象后，闻讯蒋介石将亲临前线指挥，就于7月初，一方面与阎、冯部激战，一方面在石象东田庄西，南至坡李王，北至沙沃数千亩农田中筹建机场。

7月上旬，石象周围的蔡寨、净因寺、夹岗、大屈庄几十个村庄，万名民工被强行征调，昼夜人马车流，尘土飞扬，千亩良田上茂盛的秋禾，顿间刈为平川。民工们汗流浹背，于炎炎烈日下劳作。地方官绅借机向农民敲诈勒索，一时民冤沸腾。有几家农民因拒绝在自己地里修机场，被官府兵痞生生打死。李某因病不能出工，豪绅就把他的女儿送到军中充妓。但村民并没有屈服，强烈要求补偿损失。经过据理力争，陈诚以每亩2块大洋拨款赔偿，但到农民手中仅剩每亩百文铜钱。至7月中旬，简易机场修成。

7月23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来到石象，住进石象小学校内，并设陇海线指挥部于此。这时，山东战场告急，蒋介石急令陈诚挥师东进济南。

7月27日，蒋介石亦由石象飞抵兖州督战，指挥全军分左、中、右三路，直取济南。

蒋军攻克济南后，蒋介石调2军团及第19路军重回陇海、平汉线作战，目标指向郑州。9月6日，陈诚部兵至洧川双泊河南岸，重新兵屯石象。陈诚兵至石象后，被任应岐和吉鸿昌部阻挡。陈诚的方靖团与任、吉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与反进攻争夺。蒋军的13师被困于五女店，陈诚立即组织部队从背后夹击，使冯军腹背受敌，为13师解围。陈诚部先后又在小召、毛李、董村、吴岗、老城、蔡寨等处进行了十几次战斗。

9月中旬，蒋介石再次飞抵石象，指挥攻击郑州。蒋介石采纳了陈诚的作战意见。部署了“锥形战术”作战方案。

陈诚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在开许公路东侧构筑工事，挖掘壕沟，部署兵力，自董村、冢王、小召一线，进行严密防御，小学校及石象周围戒备森严。开许公路两侧，枪炮连天。石象距离前沿阵地仅3公里。冯部曾在石象西周庄突破蒋军防线，深入到距石象1公里处的桂庄西岗。陈诚组织了一个营的兵力进行反击，激战5个小时，终于把阵地重新夺了回去。蒋介石为了彻底击败冯玉祥，派人劝降吉鸿昌，蒋介石任命吉鸿昌为第22路军总指挥。冯军失去了吉鸿昌，防线出现了缺口。陈诚抓住这个机会，向蒋介石献计，夜袭长葛和尚桥，打开平汉路，切断冯军退路。蒋介石采纳了陈诚的意见。10月5日晚，陈诚率一个团，迂回30公里，夜袭和尚桥成功。此刻，陈诚接到了从郑州传来的情报：“敌军将全线撤退”。而此时新郑还在冯部之手，部下认为不可轻信。陈诚经过分析，认为情报确凿无疑。遂当机立断，绕过新郑，直捣郑州。10月6日黄昏，陈诚的61团肖乾部直插郑州以南的二里岗，击败了冯玉祥的掩护部队，跑步入城。郑州被克。陈诚将这一战果，迅速报知蒋介石。10月7日，蒋介石飞离石象。

石象是个比较偏僻的小镇，交通不便，加之当时战火纷飞，也为了保密，蒋介石坐镇石象，指挥中原大战这一史实，报界没有披露。当时石象人只知上边来了大官，并不知是蒋介石。当战局结束后，人们才知道是蒋介石乘飞机来石象的。

陈诚屯兵石象，经过一个多月的酣战，袭和尚桥，攻郑州，为蒋介石夺取中原大战的胜利，立下了头功。为此，蒋介石大加奖勉，当即赏11师20万大洋。10月中旬，战局稳定后，陈诚的指挥部才撤离石象。

蒋军全部撤离石象后，机场占地逐步还给农民。地方豪绅借机进行吞并。

由于当时是军阀混战，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土匪在战争中弄到很多枪支。这给石象的老百姓以后生活，带来了不少灾难。由于战争，很多家庭人亡家散，或逃离家乡。据老人讲，大战后的石象，是路断人稀，田园荒芜，土匪如毛，老百姓是天天提心吊胆，心惊肉跳。

（作者王云农：长葛市石象人，文学爱好者）

王庄惨案目睹记

魏昭聪

王庄惨案，《长葛文史资料》第二辑已经刊出，现特就本人目睹，回忆如下：

我家原住在县城的小南门里。1944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吃中午饭的时候；保长李金箱领着两个扛枪的大兵，气势汹汹地挨门催人，责令赶快到王庄“开会”，并扬言说：“谁家不去人，就以通匪论处！”我家当时没有成年人，邻居张庚大爷说你跟着我，就算您家去人了。就这样，我随着张大爷出了城，那年我虚岁十二。

走到路上我问开啥会哩？为啥不在城里开，而要去到王庄干什么？张庚大爷机警地前后瞅了瞅，看看没有人，才小声对我说：“听说朱绍曾那一帮人被陈大肚抓住啦，要枪毙他们哩，可能是在王庄“处人”。我听了以后，心里忐忑直跳。

朱绍曾这个人我听说过：他是城东南唐集村人，与我姨姥姥家是邻居，他的弟弟叫朱绍禹，俺俩是同班同学。唐集村距我老家——营坊村魏庄只有三四里地。

长葛县是1944年农历四月初二沦陷，日寇的铁蹄踏过长葛以后，因急于南进打通平汉线，没有长期停留，仅留下少数统治者（小林少佐及其随从），县里的一切事务，依靠当地无赖、匪霸“治理”县政，陈大肚原本就是沾满人民鲜血的大恶霸，投靠日本鬼子以后，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之入骨！

随着长葛的沦陷，朱绍曾等率部回到故乡，作敌后抗日工作。他们回县后，收拾主要目标是铁杆汉奸、死硬派陈大肚等人。

四月初九日夜，他们深入城东南距城十五里的尚庄村，枪杀了陈大肚的贴身保镖、死硬派汉奸朱振清，缴获二十响合子枪一支。

四月十三日夜，他们又领人袭击了城南十里营坊村的陈俊明。陈俊明是陈大肚的狗头军师，号称陈大肚的左右臂，陈俊明当晚不在家；此役扑空，仅搜走其长短枪三支。

在袭击陈俊明的当天晚上，我们村里的许多人都在村南麦田里睡觉，

(怕陈大肚勾结日寇洗劫村庄)，朱绍曾等路过人们跟前，向营坊进发时，还劝大家回家睡觉，说：“麦地里露水太大，容易生病”……县城东南的老百姓。当时虽然不知道朱绍曾是共产党的地下武装，但对他们除暴安良，为民解忧除汉奸、杀恶霸的正义行为，的确是由衷的感激！我在当时虽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我总觉得他们都是好人，想不到才隔仅仅十几天，好人竟被恶霸捉住了，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

我们走到城东南角时，就见崖头上支着轻机枪，再往前走，机枪越支越多，枪口都是对着王庄村，抬头远望，王庄西头黑鸦鸦一片，站满了人，顺着路沟，城里出来“开会”的人还一直被驱赶着朝王庄走去，我们也只得跟着人流往前走。

从王庄出来，是一条往西的大古路沟，这条沟往西延伸五六十米以后，分成了两条沟，一条拐向西北，直通县城，另一条拐向正南，是一条断头沟。我们站立的地方，恰巧在这几条沟交界处的北沿。站在崖头上，居高临下，看得很清楚。

这时我们看见从南边沟里，走过来一帮横眉竖目的人，走在最前边的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大胖子，听别人说他就是大汉奸陈大肚。紧跟着他的那个人我认识，他叫陈俊明，是在陈大肚跟前最吃得开的头号参谋。据先来的人说，这些人是在南边沟里，用铡刀铡罢朱绍曾等几个头头以后，返回来的大刽子手们。

陈大肚走到沟口，腆着大肚子登上了南面的沟崖，其他人有上去的，也有分散在东西沟里的，沟里北沿有两棵小杨树，杨树上各绑着一个人，只见陈大肚——挥手，从东边跑进沟里两三个彪形大汉，手里各掂着一把铡草用的大铡刀，他们紧跑几步，蹿到树边，举起铡刀，从上而下对准树上被绑的人，迎头劈下，立时把两个人活活劈成了两半。这一瞬间可真把我吓坏了，两只手捂着眼，浑身像筛糠一样，一直哆嗦，真想跑了，可是，人们的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手持大枪，虎视眈眈，谁也别想动。他们是只准进不准出，参加“开会”的人，象囚犯一样，那个也别想走。

这时，又从王庄西路南的一座庙内，拉出来两个人（被一根绳子捆着），待两个人进入沟里时，背后紧紧跟上几个凶神，举起铡刀，劈头就砍，两人顿时毙命。就这样，每次拉出两个，一会儿杀的沟里象谷个子一样，躺下了一大片。参加会的群众。吓得蹲下的蹲下，扒下的扒下，哭叫的挨枪杆，善良的人们，真是不忍心再看下去。这时我才懂得了什么叫“惨不忍睹”。

就在这时，又从庙里拉出来两个，前边是个大个子，后边是个矮个子，持铡刀的刽子手，不知怎么把绳子给他俩弄断了，后边的小个子挨上了铡刀，倾刻间，人头被砸的粉碎，尸身扑通栽倒，前边那个大个，拔腿就跑，顺着沟飞快地向西北方向奔去，这时，刽子手们一片警呼：“截住他，截住他！……”吓懵了的群众也蓦地站了起来，站在沟南崖的老兵痞叫路长顺（他是城里衙后街的破落地主，地头蛇），从一个士兵手里要过一条枪，一枪打去，逃跑的那个大个应声栽倒，突然，他又跳了起来，冲出古路沟，向南迅疾奔逃。这时，陈的狗腿子们，纷纷包围上去，用手枪把他击毙在毛庄村东头，打死以后，陈的干将朱银山（朱振清的同乡），手执杀猪砍刀，在大个的身上又连砍数十刀。

一阵骚乱过后，从庙里仍不断牵出人砍杀。正砍时，只见陈俊明从沟南崖下到沟东头，截住了一个将要被砍的人，并向手执铡刀的黑大个比划着不知说些什么，这时陈大肚也下到沟东头，两陈又比划着说了一阵之后，就把那个将要被杀的人拉到了一边，放走了。事后听说那个被释放的，是陈俊明本家兄弟叫陈如九。说他是替陈俊明赎枪支而被误抓的。这个被陈俊明保释的陈如九，至今仍活在营坊村。

1944年4月23日下午，在长葛县城东南三里地王庄村西头的两个沟内，连铡带砍，共杀害抗日英雄三十三人。

1994年12月30日

（作者魏昭聪：长葛老城镇人，1948年参加解放军，长葛市商业局干部）

和尚桥惨案纪实

邱 实

一九四四年春，侵华日军第十二军四个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与第五航空军的一部，沿平汉线自北南下。四月十七日夜，日军分左右两翼，从中牟渡过黄河，向驻防在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暂编第十五军，发起猛烈进攻，迅即击溃了国民党军的防线，并乘势追击，用装甲车和汽车，从杨树岗村东到增福庙村东，在出齐穗子的麦田里，轧出了一条宽数十米的土路。日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为陆军中将长野）派出的右路先遣队泽野大队，于四月二十三日傍晚，在和尚桥附近攻击了国民党暂编第十五军军部及所属新编第二十九师一部，当夜占领了和尚桥。

当时的长葛，经过一九四二年的大旱灾和一九四三年的蝗灾，人民生活极为贫困，许多农户身无半分银，家无隔夜粮。和尚桥周围十几个村的群众，为了不让国民党军仓皇溃逃未及带走的粮食落入日寇之手，纷纷拿上口袋、簸箕到和尚桥粮库背粮、扫粮。极其凶狠残暴的日寇泽野大队，发现这一行动后，于二十四日（即农历四月初二）下午，突然派出一个分队，牵着狼狗，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对背粮群众进行围截。一部分较为强壮的年轻人，突出了包围圈。有四十一名老人、妇女、小孩，被日寇驱赶到和尚桥清潁河南岸的一片场地上（今长葛市氮肥厂院内）。一个日寇小队长，从人群中拉出一名年青的媳妇，狞笑着用枪刺挑她的衣襟，这名妇女愤怒地骂着，挣扎着，并啐了这个日寇一脸吐沫，日寇嚎叫着将刺刀捅进了这名妇女的胸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这样开始了。四十一名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小孩，有的被砍下了头，有的被刺穿了肚腹，狼狗在撕拽着死者的尸体，场面惨不忍睹。太阳落山的时候，日寇把这四十一名刺死或刺伤的妇孺，全部投进场边上的一眼枯井里，然后将一个打场用的石碾和两块砌井口用的石条砸了下去，砸得死难者血肉模糊。深夜，周棉妮、张革妞和另一名被刺穿肚子的妇女，从昏死中醒来，他们呼唤着、挣扎着，爬到了一起，攀拉着井口的构树枝条和爬墙草，互相扶持着，从枯井中爬了出来，顺着麦垅向各自的村庄爬去。被刺穿肚子的妇女，爬了一百多米，终因失血过多而死在了麦地里。张革妞回到了家，惊吓得神经错乱，两年后伤病复发，离开了

人世。周棉妮被刺的时候，偏了一下头，因而未刺中喉咙而被刺中了嘴角和面颊，鲜血溅了一身，日寇当时以为她已被刺死，而得以死里逃生。一九七一年四月，笔者为纪念这次惨案而专程找她访谈时，她一面叙说着当时的惨象，一面还不断地流着眼泪，抚摸着面颊上那长长的疤痕。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的一个分队，在和尚桥驻扎以后，奸淫烧杀，恣意劫掠，无所不用其极。和尚桥转运公司经理、商人李自述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惨遭轮奸后，还被剥光衣服，割去奶头，用刺刀挑死。李自述和他的店员起来反抗，被开枪打死，李的儿子李亮和其十岁的孙子被绑走，下落不明。和尚桥铁路东侧的唢呐手王群，日寇看他家放的唢呐，说他是中国军队的号兵，将其剥光衣服，割去生殖器，全身剥皮以后，挂到去英刘的路边一棵老杏树上，其惨象令人发指。身染重病的李江水，被日寇杀害后，扔到一个废弃的红薯窖里。村民胥万顺、胥春、李垛被杀害后，拖到和尚桥到英刘、和尚桥到沟李的路旁，暴尸荒野。据粗略统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群众达二百多人。整个和尚桥尸骸遍地，惨不忍睹。

一九七五年十月，长葛县革命委员会于今长葛市氮肥厂院内原枯井处，建起了“四·二惨案纪念碑”，每年清明节都有很多人到纪念碑前悼念死难的无辜同胞。这笔血债将永远记忆在我们的心中。知耻才能奋进，只有建设我们强大的祖国，才可能永远不再惨遭亡国灭种的苦难！

1994年12月30日

(作者邱实：郭宪周笔名。郭宪周：见《葛天氏与葛天氏故址》。)

母亲和妹妹“四·二”劫难历险记

孙荣山 口述/王铁柱 执笔

我叫孙荣山，是和尚桥镇于井村人，今年九十六岁。

旧社会家里很穷，我母亲含辛茹苦，拉扯我兄妹二人，我到二十八岁才结婚，我妹妹以后嫁到任庄王楼村，也是穷人家。1944年日本侵略者进犯中原，国民党军队撤离和尚桥后，村内有人说：“和尚桥留下有军麦，撒的路上那里都是……”那时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人家都没啥吃，靠挖野菜度日，我母亲听说这个信，就赶快拿着小袋子、条帚、小簸箕和别人一起来和尚桥扫麦，走到王楼村还特意叫上我妹妹，因为她家也是没啥吃，那一天是农历四月初一。谁知道她们到了和尚桥根本就没见到粮食，碰见一大帮日本鬼子端着刺刀，对着一大群妇女儿童，她们几个人也夹在中间，日本鬼子把扫麦的人驱赶到桥南边空场地上，场地边还有一棵柿树、几堆草垛，鬼子兵把几个草垛燃着，浓烟滚滚，逼着人们往火里跳，大家谁也不跳，鬼子兵嚎叫着，用刺刀划破一位妇女的衣服，这妇女骂着“畜牲”，鬼子狞笑着用刺刀向这位妇女捅去，一声惨叫……一个又一个把人刺死，鲜血一摊又一摊……一些人乘机冲出包围圈逃掉了，剩下的有三四十人，都被驱赶到枯井旁，推进枯井里，还往井里填土和推石礅，此情此景令人目不忍睹，惨叫声响作一团。天黑了，鬼子兵撤离了，我妹妹从死人堆里拱出来，也把快要死去的母亲扒出来，她把辛庄的一位妇女推上井口去，又把母亲往井口上推，因为母亲年岁大，一天没有喝一口水，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妹妹用尽全力多次推老人出井，可是怎么也推不上去。母亲说：“算了吧！我是上不去了，活不成了，也有这把年纪了，你还年轻，家中还有孩子，你一定要活下去，你先走吧！”妹妹泣不成声，不忍心抛下母亲，母亲又说：“好妮子你要听话，咱不能都死在这里，你要照顾好小孩呀！”妹妹实在没有办法，就按照母亲的嘱咐，抓着井口的枝条爬出了井口，又顺着麦垄爬，一直爬离了虎口回王楼村去了。我母亲在枯井内，又等了不知多长时间，感觉体力有些恢复，有了信心，就试着往井口上爬，居然也爬了出来，我母亲虽然回到家中，因身体受伤过重又染了重病，不能起床，四月初十，鬼子兵又闯进我们于井村，到处杀人放火，我母亲就在这天，含着对日本鬼子的仇

恨，离开了人世。现在化肥厂院内“四·二惨案纪念碑”，就是日本侵略者屠杀残害中国人的历史铁证。

（执笔者王铁柱：石固北寨人，离休干部，曾提供石固天宝宫异文碑信息。2009年8月获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纪念奖章”一枚。）

忆日寇在东刘村的暴行

胡花枝 口述/张明中 执笔

1944年农历四月间日本鬼子来刘村，那时我才六、七岁。农田里的早玉米已经出苗，因怕老鸱吃，家里大人天天叫我去地里撵老鸱。

日军来那天下午，我们几个小孩在街上正跑着玩，寨上赵老黑说：“快点回家吧，老日从禹县南王庄、蔡坡那边快过来了”。听说老日来了，他们几个吓得都跑回家了。可因为我怕老鸱刨吃玉米苗，只管提着一小瓷罐水又去了地里。谁知到了天黑回家时竟进不去寨了，寨门口有一群日本兵站岗把守。这时我吓得也不敢回家了。因为听前几天从蔡坡跑到刘村的人说，有个老日在他村把一个小男孩的肚子用刺刀豁开，又把肚子里的肠子扔到了树枝上，真叫人怕死啦。于是，我跑到寨外姚胡聚家，在磨道里躲了很长时间。在里面不时地听到日本兵的皮鞋“嘎嘎”响，嘴里叽哩咕噜乱叫，后来街上慢慢静下来了。当我又躲了四、五家后，才敢从寨墙豁口溜进了寨内。快走到家时，被一个日军马夫发现了，他问“什么的干活”，我没敢吭声，后来，他见我是个小女孩没有理我。我到家时已经是半夜了，娘见我回去了，流着泪说：“你去哪了？可把人急死啦，找又不敢出去找你”。

日本鬼子刚进寨时，能跑出去的都跑了，跑不及的也都躲到比较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我家有一棵大柿子树，枝繁叶茂，树枝向下耷拉着，象一个倒扣的大筐箩，从外边很难看到里面。头天晚上，有很多人就是躲在我家柿树底下过的夜。

第二天一早，有七、八个年轻妇女躲在了我家南屋。她们刚进我家不一会，有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闯了进来，嘴里叽哩咕噜的不知说些什么。由于听不懂他们的话，他把眼一瞪，“巴嘎哑喽”，把我娘猛地一推，径直闯进了屋里。在正当门没有搜出什么，便又冲进了耳房儿，到耳房儿里他们搜出了两个年轻妇女，一看见年青妇女，鬼子像野兽般瞪大了眼睛，嘴里叫着“花姑娘的顶好”。一时间，她们成了鬼子的猎物，虽然她们也拼命地反抗，几经挣扎，最终还是没有逃出鬼子的糟蹋。当时，我大姐就躲在床底下，吓得缩作一团不敢动。日本兵走后，大家哭作一团。过了一会儿，胡荣春在外边喊：“年轻人都到街上去吧，免得糟蹋”。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大

家只好都到街上去，把脸上抹一层锅底灰，头上蒙条老蓝布破手巾，两手捂着脸坐在大街上。日本鬼子在他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遮羞布下，没有再动街上的妇女。

宋家有个童养媳，长得很漂亮，鬼子进寨时，大家都是各顾各地跑了，没人管她，她被几个日本兵抓住拖到楼上给轮奸了，鬼子走后，她被糟蹋得下不了楼。解放后诉老日苦时，一提起老日她总是以泪洗面泣不成声。由于老日犯下的罪孽，使她一辈子没有生下一个儿女。

到了中午时分，有伙日本鬼子在胡金旺家的院子里做饭，在粪坑边挖了个坑，支上了锅准备做饭，在点火时，鬼子发现没有肉，有个鬼子齜着牙，对胡金旺说：“你的咪唏咪唏”随后便拿着战刀进了牛棚，举起钢刀在牛屁股上砍了一大块肉丢进了锅内。牛痛的哞哞直叫，浑身哆嗦，眼泪直流。等肉煮熟后，鬼子们一边吃着牛肉，一边看着牛痛苦的样子疯狂地哈哈大笑。老日吃饱喝足后，用脚一蹬，把大半锅肉汤倒进了粪坑里。

下午后半晌日本鬼子开走了。人们听说鬼子走了，都陆续跑了出来。宋某某家是大户，听说老日来了领着人都躲了出去，现在鬼子走了，又都从外边跑了回来。在外躲了一天饿得不行，掌柜的叫家人烙点油馍吃，当用升子挖面时发现很臭，仔细一看是大便，原来日本鬼子屙到了他家的面缸里，这一下可把宋家气坏了，大骂老日没人性。

日本鬼子在刘村虽然只呆了一天，但所犯的罪恶和我们村人所受的屈辱，是世世代代都忘不了的。我们中国人要自强不息，使国家强大起来，永远不受日本鬼子的气。

长葛抗日活动见闻

袁耀坤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我于8月间考入长葛县立第一小学五年级。到1939年暑期后，被保送进入长葛县立初级中学。至1942年春，考入河南省立汲县师范。最后于1945年春，转入省立开封师范，抗战胜利后，学校返回开封，于1946年夏末毕业回县任教。所以，我的二年高小、三年初中、三年师范的八年学校生活，基本上是与八年抗战同步进行的。由于我长期处于抗日战争氛围之中，对当时的战争情况有所见闻，尤其对长葛的抗日活动了解较多。今仅就所记并参阅其他有关资料撰成此文，以使世人当知我县在八年抗战中不是一潭死水，虽无狂飙巨浪，亦有抗敌御侮的光辉诗篇。

(一)

我进入县立小学不久，平汉线北段战局吃紧，第四十二野战医院从前方迁到我县。在当时一切服从抗战的情况下，县立一小大院让给了野战医院。全校十二个班分散到县民众教育馆、县立中学等处上课。我班就是在中学院内上课的。接着就有大批伤兵从前线运转到县。为了慰问他们，学校把我们高年级的学生组成若干慰问小组，于每天下午上罢正课，分赴医院各个病室进行慰问。我们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儿童，心底纯洁，情感炽热，看到他们卫国流血，杀敌负伤，既同情又敬仰。所以在与他们接触中。我们十分热情，围在他们身边，问寒问暖，关切备至。他们也很受感动。在慰问中，为他们服务最多的是代写家信。当时的伤员，大多不认识字，即使有少数认字的，也因伤势困扰而掂不起笔。所以在以后较长时间的慰问中，为他们写信就成了我们的主要任务。

学校里毕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国难当头，强敌压境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对战局的发展还是十分关注的。学校在集会时经常报告时事。学校院内设有《时事摘要》专栏，天天要换内容。为了应付学校的时事测验，每天都有很多学生拥在报栏前抄录新闻。当时虽有些被动，但对我们年幼无

知的小学生了解时事、关心国家大事来说，却起了积极的督促作用。

1938年春，平汉、津浦两线上的国军节节败退，日寇从北、东两方面威胁着河南省境。当局为了掀起保卫大河南的抗战高潮，首先在中、小学生中举行“保卫大河南”讲演比赛。比赛分中学组、小学高年级组和初年级组。各学校分别选出代表后，集中到县政府大礼堂进行比赛。比赛时，参加听讲的有学生、教师、各机关职员和城厢商民。演讲题目为《保卫大河南》中、（小）学生应尽的责任。参赛代表登台讲演时，慷慨陈词，情真意切，有的甚至捶胸顿足，声泪俱下，台下听众无不振奋动容。通过这次讲演活动，参赛代表和与会听众都受到深刻的抗日救亡教育。同时也激发了抵御外侮、保卫家乡的爱国热情，入初中后，这种讲演比赛还经常举行。1939年冬，我曾以中学组参赛者的资格，到郑州参加过河南省第一行政区举行的演讲比赛。

抗战初起，县立初中的部分教师和同学就组织了话剧团。深入城乡作抗日宣传。记得1937年初冬，他们曾在县城衙前街与朱巷街交汇的丁字口处，演出了抗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围观群众充满街巷。翌年正月十三古庙会上，他们还在小南关戏楼上公演过抗日话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扮演日本军官的张瑞昌和扮演女角的乔石云。张瑞昌个大体胖，粘上东洋胡，很像日本鬼子。在台上演出时。他的言行都能把日本强盗对中国人的凶恶残暴嘴脸暴露无遗，很能激起观众的同仇敌忾救亡图存的爱国正义行动。

1939年8月，我进入县立中学不久，在李华民和董芳轩两位老师领导下，挑选部分学生组建了话剧团。我们班参加的有陈西坤、冯金昌、杨国治、张坤生、吴书元和我等几个同学。加上其他班参加的如吕宗烈等，共有十几个人。开始，我们就排演抗日话剧《东北一角》。内容写的是东北某村一家人被日寇威逼、蹂躏、进而杀害的事实经过，情节悲惨动人，很有现实教育意义。剧中角色不多，有老头、老婆、女儿、日本军官、汉奸和狗腿子。此外，有几个日本兵和一些群众，都是些陪衬角色。经过紧张排练，到“双十节”就在中学大操场公演，演出后效果很好。观众在同情剧中遭难人的同时，特别痛恨日本鬼子的残酷暴行。此后，杨国治和冯金昌二人，还自编自演了一幕哑剧：《挣扎》。剧中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鬼子，各持短刀进行搏斗。开始日本鬼子占上风，中国人经过挣扎苦斗，最后把日本鬼子刺死，获得胜利。剧情虽然简单，却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大灭日本鬼子的威风。同时，也象征着中国人民抗战的最后胜利。演出后，观众一片欢声笑语，真是大快人心。第二年春天，我们又排演了一出大型抗日话剧，只是时

隔太久，现在连剧目名子也忘掉了。

到1941年末，县中附设的短师班将要结业之际，在陈镜波老师指导下，由王世荣、郭铁生和申海松等同学排演了一出抗日话剧《上海之夜》。演出后，引起校内外的极大反响，观众深受教益。

1942年暑期，我原在的初中班刚刚毕业，我已从汲师放假归里，由陈西坤牵头，我和张坤生、高涌谦、杨国治、冯金昌、武天宝、郭凤奇等人参加，组成了《醒狮剧团》。下设组织、剧务、总务等股。排练地点设在县城东门外端壁寺内。由于经费无着，虽然排练一段时间，但没拿出任何成果。后来为了筹措经费，使剧团能以存在于社会之上，为抗战救亡做广泛的宣传工作，陈西坤同学曾西上临汝，东下临泉，不怕疲劳，往返奔波，终因得不到当权者的支持而作罢。满腔爱国热情，到头来只落得心灰意冷，徒劳无功。

在初中学习那段时间里，每逢纪念节日，学校和班级都出壁报，贴到街上，进行抗日宣传。此外，在校内不少同学三五成群自动组成小组，经常出小型墙报，有周刊，有旬刊，时间长短不一。内容学生写作或转载有关抗战方面的诗歌或文章，既能锻炼写作，又能自励励人，对我们青年学生在品德修养和写作技巧诸方面均起到很好的作用。

(二)

八年抗战当中，长葛县境曾遭到两次骚动，一次沦陷。在那敌寇猖獗、国无宁日、炮火连天、身家难保的险境中，长葛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坐以待毙。他们必然有组织或自动地拿起武器，与敌搏斗。在长葛人民抗敌御侮的斗争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第一次骚动，是在1938年的五六月间。早在开封失守前的五月下旬，河南省主席商震的部队就陆续西撤。途径长葛县境时，抓人牵牲口，搅得人心慌慌。当时县里已经组织起地方武装——“长葛县抗敌自卫团”。司令由县长马维珍兼任。下属三个区团，每区团约四五百人，共计一千多人。当时国共已经合作，共同抗日。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已派共产党员于永林来县搞民运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力量。于永林到县后，即与长葛地下党员陈伯瑾等同志取得联系，共谋长葛人民抗敌方针。他们根据当时县内实际情况，决定了开展工作的步骤。根据各方面条件，他们认为县北罗干卿团下属有赵华山大队比较容易团结争取。于是于永林即偕谷德荣、董书林、董金瑞

等同志来到三官庙赵华山大队驻地，相机进行工作。大队长赵华山不识字，是个粗人，但有胆识，有正义感，对于永林等同志的来队工作深表欢迎，对他们的抗日举措极为赞许。于永林等同志就立足该队，给官兵教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战教育，协助训练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该队官兵的政治、军事素质均有显著提高，抗敌情绪也十分高涨，恰在这时，开封沦陷，国军溃退，有一股四五百人的敌寇，由开封经尉氏、洧川疯狂西窜，大有侵犯长葛之企图。为了防止日军犯境，于永林、谷德偕同大队长赵华山于六月七日率队布防老庄尚一带，监视敌人。当时日寇意在新郑，沿老庄尚北边公路象疯狗一样西窜。团队未予阻击，即撤防宿营于老庄尚寨内。

日方获悉六月九日，国军扒开黄河大堤，急令西犯部队东撤。当他们回窜至老庄尚附近时，赵华山部已埋伏在沙岗上严阵以待。由于战士们杀敌心切，未待下令就开抢射击。战斗打响后，鬼子从三面向我阵地包抄过来。我军后撤一步，准备以有利地形继续战斗。不幸，于永林在指挥中右臂中弹负伤。谷德荣急忙扶于退下包扎。前沿阵地只有大队长赵华山和中队长董青山坚守阻击敌寇。赵华山当时表现英勇，趁敌人靠近之机，用长枪击倒五六个鬼子，压住了敌人围攻的嚣张气焰，掩护了部队的安全后撤。战斗中，附近村庄有枪的群众也鸣枪参战。一时枪声四起，喊声震天，把鬼子吓得晕头转向。孤军深入、回窜受阻的日寇，深怕全部被歼。慌乱东逃。

这次战斗，曾受到长官司令部的嘉奖，还发给于永林同志100元作为养伤费用。后来，武汉《新华日报》披露了这一消息。

那天凌晨，战斗枪声传得很远，我村也能清晰听到，很多群众都站在村边听风声。突然从西北方向传来两响大炮声。天色将明，枪声由稀转停。后来才知道我区团队在北乡打日本鬼子了。炮声则是来自在铁路上巡逻的钢甲车。

西犯日寇退至尉、洧交界一带，因受出堤黄水所阻而集结待援。为了消灭这股困守之敌，县抗敌自卫团奉命出县配合国军作战。县长马维珍电请省府核准之后，即命在逃毒品犯陈秀峰任第一区团副区团长，以戴罪立功之名率队前往。又请寓居长葛曾任西北军混成旅旅长的崔鸣山为前线总指挥。经过一番筹措之后，于六月十八日，一千多名抗日战士，在陈、崔二人带领下，直奔敌人的集结地点——朱曲。部队到达时，敌人已仓惶北逃。我团队即尾随追击。从朱曲北上约三四里，与敌遭遇。敌人开炮，我部亦布阵还击。崔即派出一部分兵力，包抄敌人，敌不支溃退。我部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10余支及辎重一部。初战告捷，士气更为振奋。

十九日拂晓，崔率部北追日军。那时，日军已龟缩到门楼任寨内。我团队追至门楼任寨东南之蔡家、文家等村时，才与国军24师取得联系。

午后，我团队与24师同时向寨内发起攻击，激战两个多小时，战况惨烈。24师一个排越濠攻寨，遇敌暗堡，全部牺牲。我团队战士郭长明、王锡金（均为石象人）阵亡，左场人郭香负伤。

夜里，我团队派出一部兵力，会同24师一个加强连，由一名连长指挥，袭击盘踞冯村之敌。接战不久，敌有增援，我军撤出战斗。

六月二十至二十三日，因下雨，枪声时起时落。冯村之敌两次来犯，均被我方击退。

六月二十四日，鏖战竟日。至深夜，敌方枪声大作，我军起而还击。继见寨内火起，枪声渐停。我团队与24师攻入寨内，而敌已被接济渡黄东逃。我团队当即出寨，向南转移。

六月二十五日，我团队辗转南撤，渡过双洎河抵达古桥。第二天还军董村。

陈秀峰，体胖肚大，行笨如猪，据说到了前线，枪炮一响，吓得连马也骑不上。有说是卫士用个大筐箩把他抬下阵来。不管如何，这次跟着打仗，总算戴罪“立功”了。既然立了“功”，当然可以赎罪。所以陈回县后，罪责自然不予追究，而又升任自卫团副司令，屯兵石象，弹冠相庆。真正指挥若定、决胜沙场的前线总指挥崔鸣山，却默默无闻，老死家中。

团队回县后，为了追悼阵亡战士，在县城东刘彦庄村南大路上搭台演戏，并召开公祭大会。会场上白布满棚，挽联、挽幛悬挂两侧，身临其境，怆然而有痛悼之感。

这一骚动，时间最长，影响面也最大。学校停课，商旅停市，农民虽不辍耕耘，也总是惶惶不安。敌机经常临空骚扰，枪炮声日夜不断来自东北方向。敌机曾先后两次轰炸县城，我村和我村附近的傅桥，也曾受到敌机轰炸之苦。敌机在一次轰炸县城之后，还投下大批传单、漫画和良民证。其内容无非是自嘘、造谣，蛊惑人心。

第二次骚动是在1941年仲秋节前后。这次骚动，时间不长。郑州失而复得，骚动即告结束。那时，我正在初中三年级。只记得有几天晚上趁着皎洁的月色，从东调往郑州前线的国军络绎不绝。他们全副武装，衔枚疾走，足见前方战事之紧迫。

我县那时属河南省第一行政区，专员公署设在郑州。郑州失守，守军有责，而地方长官亦不能辞其咎。当时，各县抗敌自卫团已经撤销，地方武装

改由县国民兵团负责掌握。国民兵团下属有个常备队，约100多人，相当于一个连的装备。行政专员杨一峰，既是地方行政长官，也是地方武装的总指挥。他为了克复郑州，就令调所辖各县常备队，集中其身边，以备配合国军攻守之用。我县常备队就是当时奉调赴郑州前线参战的。我有个族侄叫袁君山，他是县常备队战士，郑州收复回县后，他曾经给我谈及他们部队配合国军作战的情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郑州城西南收复黄岗寺战斗。经过激烈攻战，把日寇从黄岗寺赶跑了。当时我曾经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以记其战斗始末。可惜这篇日记早就在战乱的年月中散失了。

郑州战役，我县参战人数比第一次骚动时为少，同时也没有人员伤亡。抗日获胜而不流血，在长葛抗日战争史上堪称首例。

这次骚动，因战场距县境较远，群众听不到聒耳的枪炮声。学校照常上课，商店照常营业。国军夜间过境也没惊扰百姓。敌机也没飞临县境进行骚扰，更没有投弹轰炸。说明日寇成了强弩之末，已不象战争初期那样猖狂了。

长葛县经过前后两次骚动之后，终于在1944年4月23日县城沦入敌手。当时，城墙已经拆除，仅余两米来高的城基，其上挖有弯弯曲曲的战壕。国军从中牟、新郑一带撤退时，根本就没有固守长葛的打算。长葛县城只有自卫队和常备队200来人的地方武装。他们虽然也在县城以北布防迎敌，但由于兵力单薄，装备简陋，日寇入境，他们不战就跟随县长孙锡章向县西转移了。所以日本侵略军就从县北长驱直入，直至窜进长葛县城，也未遭到任何方面的阻击。

长葛县城被敌占之后，地方上一时非常混乱。有截路的，有抢劫的，也有自动组织一些人枪奋起抗日的。县城东南唐集村的朱绍曾，就是后一种人中的佼佼者。

朱绍曾原在国军某部独立第一旅三团二营四连一排任排长，曾在尉氏、洧川一带把守河防。当日寇进攻中原时，他随部队辗转于鄢陵、扶沟等地。在转移中，他感到部队只顾疲于奔命，哪有站稳脚跟抗日之举。遂联络排里十二个弟兄，离队返乡，组织游击队，实现其抗日救国之宏愿。他们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动员群众，搜集枪支，以扩充壮大抗日力量。

县城东南一带，是假抗日真投敌的大汉奸陈秀峰的势力范围。朱绍曾认为，如果不除掉陈秀峰，他们就很难在这个地区抗日图存。于是就与陈秀峰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4年农历三月，初九这天，城东南苗庄有古庙会。陈秀峰携妻带女

到苗庄苗玄家串亲戚。朱得知后，当晚带人到苗庄将苗玄住宅包围，欲捕杀陈并夺其枪支。不料，陈已于下午离开苗庄。朱绍曾扑了个空。陈既侥幸没死，却对朱绍曾严加戒备起来。

后来，朱绍曾为了扩充人员，壮大力量，在抗日大前提下，与地方上的杨灿文、李小林等几股武装联合起来，组建“长葛县抗日救国军”。经商定，杨灿文任司令、李小林任副司令。下辖四个中队，戴清敬为第一中队长，赵梦珂为第二中队长，朱绍曾为第三中队长，周三全为第四中队长。全部合计共有人枪 200 有余。在当时来说，是县境较强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长葛县抗日救国军建立后，陈秀峰坐卧不安。在自己的地盘上兴起一支与自己政见完全相反的游击队，与自己十分不利。尤其朱绍曾对其有扑杀之隙，更使陈产生朝不保夕之疑虑。事有凑巧，朱绍曾和杨灿文往许昌县境起枪未成，返回后，朱部驻于城南尚庄村。朱得知陈秀峰的卫士朱振清夜宿官庄时，当即率部前往，将朱振清枪杀于官庄西南地，并夺得了他的手枪和子弹，陈秀峰知道后，更为恼怒，就下狠心、施毒计，非把朱绍曾及其所部斩尽杀绝不可。

陈秀峰以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等卑鄙手段贿通李小林、杨灿文之后，以整编为名，先诱捕了朱绍曾及其卫士，继将朱所部四十来人绑起来，押到南王庄西南地，用铡刀、杀猪刀将其中的三十三人杀害。一支坚强的抗日游击队伍，就这样被大汉奸陈秀峰血腥镇压下去了。杨灿文、李小林遂与陈秀峰同流合污，并助纣为虐，使陈一如既往地干着坑国害民的罪恶勾当。

朱绍曾，年轻有为，精明强干，有抗日报国之心，无机警图存之谋，志欲灭寇而惜其寇未灭而身先死，力能除奸而痛其奸未除反为所害，一腔热血，洒于桑梓故土之上，举家老幼，殉于庭院荒野之中，可谓惨且痛也。但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已为朱和他的难友及其家属，伸张正义，复仇雪恨，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匪霸陈秀峰及出卖他的内奸李小林。参与杀害他的杨灿文、王营等不肖之徒，早在解放前已遭枪击殒命。朱绍曾等若在天有灵，当可以瞑目含笑于九泉了。

我县沦陷后，坡胡的李建堂和禹县无梁的郑发昌组建了一支抗日游击队。经常活动在长、禹交界地带。1945年7月初的一天，有一股日军从石固寨北门窜出，欲向坡胡一带侵扰。当时李、郑的游击队正在坡胡、东胡等村驻扎。李建堂得知敌寇从石固北扰时，就商同郑发昌一起去抗击敌人，以免被动而使日寇的企图得逞。李、郑当即派其部属向南截击。部队从东胡出发时，前是马队，后跟步兵，士气高昂，疾驰而进。当部队进抵花园、王庄

之间的二郎庙附近时，与敌遭遇。一时，双方对战激烈。我方有个战士表现英勇，他利用二郎庙作掩体，时而庙前，时而庙后，伺机瞄准射击敌人。由于参战人员的阻击，压住敌人没有前进一步。最后，只得退缩石固寨内。这次战斗，阻止了日军向北侵犯，保护了坡胡一带村落未遭劫难。只是我方阵亡一人。事后，曾在东胡举行公祭大会，以示悼念之意。阵亡战士是禹县人，住址和姓名均待调查。

以上所记，是长葛县人民在八年抗战中的抗日活动梗概。由于年久多忘，记述难免有谬误、遗漏之处。请知情者予以补正！

所记之事，仅限原长葛县辖区之内，不包括解放后划归长葛的原洧川部分。

（作者袁耀坤：见《长葛县地名综述》注。）

长葛县抗敌自卫团抗日纪实

王世荣

一九三八年春台儿庄战役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指挥其第一军团司令小敏四郎，第二军团司令香月清司，第三军团司令坂垣征四郎，及伪军刘桂堂、张步云、张宗援、张济源、刘佩忱等，沿津浦、陇海、平汉三铁路线，向鲁苏豫皖四省广大地区入侵，企图与华中战区松井石根会师，攻取武汉（当时国民政府中央所在地），气焰十分嚣张。其中尤以第二军中将军长西尾寿造，第五师团坂垣，第十师团矶谷廉介，第十四师团土肥原贤二等部，最为凶恶。

当时国民党军负责指挥商丘防线的薛岳，指挥黄河河防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虽奋力堵击，官兵浴血抵抗，亦不得不渐次后移。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土肥原在鲁西荷泽北面之董口附近强渡黄河。五月十四日陷荷泽城，二十三日陷兰封，六月六日陷开封，六月七日敌步骑兵千余，配战车十多辆，侵至中牟附近。

另一股日寇，第二军军直部队及第十四、十六师团，分别向开封西南方面进侵。六月十一日敌骑兵四百余人，配炮四门，从尉氏、朱曲、洧川，经长葛县马家寨、老庄尚等村至新郑车站，炸毁新郑车站南铁路桥梁一孔，使平汉路一度中断。

当进侵新郑车站日军经长葛县马家寨、老庄尚时，遭我长葛抗敌自卫团袭击，打死打伤日军五六名，罗庄村罗增宪、罗喜和王皮庙村吕金池三位团队战士阵亡。《新华日报》九月份报导了此次战斗。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于六月一日从郑州移驻洛阳，电请武汉中央“以水代兵”，命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于六月九日掘开黄河大堤放出黄水。虽暂时保住了豫西商雒及中国西部等半壁河山，得以重新部署，但使豫皖苏三省一千多万人民遭受惨重损失。

日军得悉黄水出堤，急令其西侵部队撤退，聚集在朱曲之敌千余名亦乱作一团。当敌人渡过黄河时，长葛县抗敌自卫团奉命准备出县作战。但县长马维轸（山西绛县人）却发了愁，第一由谁率领出县？第二团队怎样整编？第三怎样补给？马即开会讨论，与会绅商一致推荐陈秀峰率领出县。

陈秀峰，外号陈大肚，本县董村乡口王村人，曾任团总、联保主任等职。一九三六年八月，因制毒贩毒被开封绥靖公署羁押。一九三八年二月，豫东吃紧，押犯南移。其四弟陈西进纠集宋宪彬、王荣、赵根兰、王晋昌、刘玉宾（南阳人）、栗寿轩（上蔡人）、李廷臣（许昌人）等人，并买通洧川常备队全某、查某，于长葛东高车贾村附近之开（封）—许（昌）公路上将陈劫走。先藏石象东坡李王村保长王根立家。又逃陕西渭南其二哥陈树章及西安张礼堂等处隐匿。

当时正在用人，马维轸只好电省，准其戴罪立功。由商务会长王瑞桐担保，派张廷弼、张凌九去陕将陈找回，委任为自卫团第一区团副区团长。

长葛县抗敌自卫团是奉省令成立的，由县长马维轸兼任团长，副团长由军事教官程表（湖南人）担任。下按行政区划设三个区团，第一区团长由区长杨少贤（豫北人）兼任，副区团长为陈秀峰；第二区团长由区长翟慎修兼任；第三区团长由区长尚延昭（字力青，洧川人）兼任，副区团长为罗干卿。

当时全县为五十个联保，第一区十八个，第二区十六个，第三区十六个。每四个联保成立一个中队。凡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男子，除病残者外，都有当兵义务。枪弹、伙食由各保供给，军官由县委派。按三三制编制，每班十二人，设正副班长各一人，三个班为一分队，三个分队为一中队，加上号兵、传令兵、伙夫等勤杂人员，一个中队约有官兵一百二十多人。除军官有少量津贴外，士兵并无薪饷。但大家为了抗日，情绪仍然很高。

陈秀峰虽能纠集一些人，但不懂军事，遂又请寄居长葛的崔鸣山为“前敌总指挥”。

崔鸣山，字应岐，鲁山县北泉上村人。早年在毅军当过哨长，后入西北军任骑兵混成旅旅长。阎冯蒋中原大战后，离军寄寓长葛。日寇入侵，崔极愤慨。县长及县内绅商亲往聘请，自然应诺。遂与陈秀峰驻扎董村，委刘庆云（杜村寺西张庄人）为军需，郭奠五为副官，整编全县团队，剔除老弱，挑选精壮战士一千余人。

在董村整编后，不论官兵，每人发一枚布质白底兰边臂章，中间写有兰色“马”字，取用团长马维轸之姓，以示为长葛县抗敌自卫团〔注〕。

六月十八日下午，长葛县抗敌自卫团奉命急行军开赴尉氏前线。崔、陈率团队从董村出发，经洧川向东搜索前进。抵朱曲，敌人所放之火尚在燃烧。我团队急出朱曲北门，追约三四里，即与敌人接上火。敌人开了炮，崔

也下令布阵，并派出一部分兵力，由宋宪彬、王晋昌率领，从小路包抄过去，我们利用熟悉地理的有利条件，打得敌人狼狈逃窜。缴获轻机枪两挺，三八式步枪十余支和辎重一部。初战告捷，士气更为旺盛。因我部纯系新兵，不便夜战，崔下令布置警戒就地宿营。此次战斗，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新华日报》第二版报导了“朱曲被我收复”的消息。

六月十九日拂晓，崔鸣山下令继续前进。这时，黄河水已越过尉氏流至鄢陵，尉氏县境低洼处已黄水横溢，道路时常中断。敌军约七百人，炮十门，战马百余匹，困居尉氏县西南约十五华里之门楼任寨内。

我团队追至门楼任东南约二里许之蔡家、文家（均村名），与国军第二十四师取得联系。

第二十四师是湖南队伍，师长李英在徐州已经打了很久，全师三个团，仅剩编制的一半。随着战线西移，奉命在开封附近休整。黄河决口，又奉命来此狙击敌人。

六月十九日下午，我团队与第二十四师同时发动攻击，激战约两个多小时，状极惨烈。第二十四师一个排爬过壕堤攻寨，不料遇到敌人暗堡，全部牺牲。我团战士郭长明、王锡金（均石象人），亦在这次战斗中阵亡，另有左场人郭香负伤。

六月十九日夜，我团组织一部分兵力，由宋宪彬、刘玉宾率领，第二十四师派出一个加强连，由一名营长指挥，同去袭击盘踞冯村之敌。激战约二十多分钟，因驻栗林之敌来援，我军只好撤退。

六月二十至二十三日，因天雨时打时停，并两次击退由冯村来犯之敌。

另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我团队战士王锡林（董村乡竹园董村人）、李振邦（小司马村人），见南寨墙上有一日军半露身体。王、李想夺其枪，刚爬上壕堤射击，原来是个草人，寨上火力齐发，二人险些丧命。崔鸣山闻讯跑出指挥所，调来两挺重机枪，将敌人火力压下，二人才得退了下来。

二是，当时寨里寨外及附近村庄老百姓都已逃光，日军仅靠杀马和空投补给生活，我团队所带给养也已吃完。虽派人回县催送，因天雨阻路，亦难及时补充。特别是有一次送给养大车行至洧川北被土匪刘金殿截去，还牵走了几头牛，致使我团队挨饿数日。

六月二十四日鏖战竟日，至深夜枪声又起。我官兵沉着应战，约一个多小时，寨内火起，枪声渐停，我团队同第二十四师向寨内插入。这时天将大亮，遂逐屋搜查，而敌人已向东北方向逃遁。遥望黄水，泛滥更广，我团队遂向寨南转移。

六月二十五日，我团队数绕黄水，经栗林、王村、周杨、张庄、齐庄等地，过杜公河到五村，又经罗魏、堤杨、宋庄，渡双泊河到古桥，休息一天。第二天，经黄岗返回长葛董村。沿途又同日伪军打了两次。陈秀峰的坐马被马夫（河北人）窃取逃走，陈由卫士换班驾着，才没被黄水围困和遭敌俘虏。

长葛县抗敌自卫团此次在门楼任抗日，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也有如下记载：

“六月十五日以后，由于泛滥的河水扩大到尉氏附近的第十六师团方面，第二军除调用第十四师团工兵两个中队外，又逐次增加了架桥材料两个中队，折叠船四十，独立工兵第十一联队主力，然后向泛滥地以外撤退。

“方面军于六月十七日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六月十六——二十四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约 61.50 吨……第十四师团的中牟部队，至六月二十三日夜，大部已集结在开封附近。

“第十六师团主力，于二十四日在尉氏西南地区给接近来的约两个师之敌以沉重打击。二十五日夜渡过尉氏东面的大泛滥地带（幅宽 600 米，流速 2.5 米）的难关，接着通过泛滥的数条水流及湿地带，在通许附近集结……

“第二军……二十九日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会（第二军有关战死人数为 7452 名）。日本昭和十六年六月”。

在这次战斗中，我缴获日军的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甚多，仅马鞍子就拉了几大车。后来，自卫团回县驻防石象整训时，专门成立了一个骑兵中队，由王晋昌任队长，所用马鞍子多是从日军手中得来。原来的老套筒枪也多换上外国造，每队还配上了轻机关枪。

陈秀峰回县升任自卫团副司令，遗缺由崔吉祥接任第一区团副区团长。至于对陈秀峰的通缉令，自然也予以撤销。次年（1939 年）农历二月初，县内绅商和三个区长及五十个联保主任，在口王给陈立了两幢石碑，以彰其功，解放以后，碑已被推倒不知下落，仅剩一块碑头，现存口王村陈泊东家。

崔鸣山返县后，仍然家居至病死。

一九三九年春，长葛县抗敌自卫团奉令取消。陈秀峰调任县国民兵团总参议，其余官兵均遣散，各回各家。

[注] 当时在战争年代，为守机密起见，各军事单位多取其首长姓名一

字或各种词汇格言，印发臂章佩带，而不直接书明部队番号及部别。例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佩带“执戈报国”臂章等。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作者王世荣：见《辛亥革命对长葛的影响》注。）

勿忘在日寇铁蹄下的历史

程廉清

洧川第一次沦陷

1938年我正在洧川（城厢）县立第一小学上学，经常听到校长刘丙寅（花桥刘村人）、教师邹吉甫、董静一、董正民（均董庄村人）讲述和控诉日寇侵略中国，在华北杀人放火的残暴罪行。就在6月初放麦假期间，大街上传出消息说日军打过来了，晚饭也不吃了，大人们商量逃离县城，这时城里大乱，人心惶惶，我们急急忙忙跑到城西张碾村亲戚家。到底往哪里躲，谁也拿不定主意，当晚又到董庄董正民（字介夫）家里，他们正在商量着躲日军，我们就坐在院子里等待。半夜时分，张碾村表兄张河清和董正民老师家各备了一辆四轮大车，把眷属送往西北乡柴村，黎明时到了一位姓马的家中。

在离开董庄后，路上遇到不少逃难的群众，走了大约七八里路，我们坐的车被拦住了，护送车的人喊：“干什么的，哪是谁，过来！”像训斥人的喊话，镇住了土匪。只听到说是护路的，没事！没事！我们过去以后，护送车辆的人说这些“东西”又出来了。洧川西北是沙土窝，地瘠民贫，铤而走险当土匪者不少，他们乘人之危，趁火打劫。

此村西北沙岗上林木茂密，有槐杆、紫穗槐、荆条，杂草丛生，一眼看不到边缘，相隔两三丈远看不见人，是个躲避的好地方，此处也不临官大道，来往的人也少。我们在柴村住有十来天，听说县自卫队长贾兰田（字月樵）领着人打日军，日军过县城没有敢停就跑了。这才敢回到洧川小南街家里。日本到了朱曲镇杀了很多人，有砍头的，有剖腹的，手段极其残忍，毒辣。

“以水代兵” 哀鸿遍野

古代兵家相争，曾有“以水代兵”的战例，但多有教训。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决河以阻金兵，就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

难。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决定，在郑州北花园口扒堤决河，以堵日军西进，但是黄河决口洪水漫溢。据有关资料记载：黄河决口豫皖苏三省四十四个县市，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泽国，八十九万多人葬身洪流，一千二百多万农民流离失所，这笔血泪帐日本帝国主义是赖不掉的。黄河决堤之后，日军暂时龟缩在开封和新黄河（即贾鲁河旧道）以东，泛区农民到处流浪。西华、太康、扶沟、尉氏的难民，携亲带眷，像拧绳一样往西逃。我的老师李正三是太康逊母口西闫庄人（今属板桥乡），在逃黄水中，他父亲因人多沉筏淹死，母亲逃出后饿死在许昌，全家失散，他本人流落到老庄王村摆摊卖烟糊口。尉氏县东营孜村人赵玉囤，全家四口人仅留他一人活命，流落在我村给人扛长工。尉氏县张寺街村张盈，逃出黄水后，将他不足十岁的妹妹送人，当了童养媳。

开展抗日活动

日军盘踞开封之后，小小的洧川城也成为日寇空袭的目标，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敌机在洧川上空盘旋，或扔炸弹，或机枪扫射，或低空俯冲。我同学根喜的弟弟被炸死，新堂街一个唱曲剧的青年也被炸死。抹角楼处于西大街与南大街的丁字口，那里有粮行，干鲜果行、杂货店等、客商云集，几家饭馆生意红火。自被日寇飞机轰炸以后，市场萧条，群众整天忙于挖防空洞，人心慌慌，有时长途电话台（群众叫局子）警报不响敌机就来到，听到飞机响声人都发怵，机枪扫射更难躲避，跑警报躲避日寇空袭，农民种地都种不成，学生有学校上不成。日寇投降后，群众在小学门前大坑洗澡摸鱼，还捞出几个未响的炸弹。

1939年春，城厢小学新任校长赵文灿（字焕亭）积极主张抗日，为不让学生荒废学业，他一方面在学生中组织抗日宣传队，抗日歌咏队，抗日讲演队和募捐队，开展爱国教育和救亡活动；一方面改变教学方法，上午上两节课后，老师就领着学生分散到城郊上课，经常去的村庄有丁庄、常湾、魏征庙、仓李等。中午老师和村上保长或甲长结合，请他们给我们烧开水，我们趁中午吃饭时开展救亡活动，列队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毕业歌》、《松花江上》、《救亡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和《游击队歌》，一唱就是十几支歌。我是俺班歌咏队打拍子的，高年级领唱打拍子的是东大街李钧，俞家胡同仝卯寅，小班的有北关的王铁林等。唱罢歌曲演讲队演讲，讲南京大屠杀惨案，讲台儿庄抗日胜利消息，讲卢沟桥

日军侵华事变经过，讲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以及抗日游击队的故事，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到底，决不当亡国奴。当时洧川中学校长是赵体恒，他利用农历三月十八洧川城隍庙古会，让县中教师仝子敬（西关人）和学生周庆云（洧川东周寨人）在东大街与小南街丁字口“广大粮行”门前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群众看到东北逃难的女青年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卖唱，都难过得痛哭流涕，纷纷捐钱。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狗强盗！还我华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打倒汉奸卖国贼！一呼百应，整个县城都活跃起来了。他们化妆演出非常成功，没有群众看出来是教师仝子敬，也没有人看出来是中学演的街头剧。我清楚的记得我叔说他也扔钱了（捐献），家里人想法看一看，他说不要去，人挤不动。我三哥笑着说，演东北姑娘的是庆云（他们同班，而且经常到家里玩）。我叔父坚持说你胡说，子敬和您大哥同学，庆云成天来，我会认不出来，真是东北逃难的。有一次县中在新堂街搭台演话剧，我堂兄在剧中扮演鬼子兵，抢中国的“花姑娘”被抗日义勇军打“死”了，回到家中我婶母说打死你活该。长葛中学的演剧队也去洧川城里演出。回忆当时抗日宣传活动搞得非常活跃。

我在学校除参加歌咏队外，还参加了抗日募捐队。一次到县长王克佐的办公室，请他捐钱慰劳抗日将士，他很快给了一块银元。我们嫌少，照着老师的交待，像背书一样讲抗日的道理和重要性。结果王县长又给了两块银元。

在麦收前，学校里住了不少伤兵，我们的六个教室都用完了，大礼堂也住了伤兵和卫生队。趁这个机会，我们到农村宣传募捐，群众也知道有退下来的伤兵，经宣传动员，群众纷纷捐钱让买药，很多老大娘、老奶奶把鸡蛋罐都掂出来了。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带着慰劳品慰问伤员。他们见到我们后，挂彩的伤员泪流满面。抗战时期药物奇缺，他们为保卫国土，浴血奋战，流血流汗，受到伤病的折磨十分可怜。

日寇的经济封锁

华北沦陷，江南失守，山河破碎，河南省的省直机关，国立、省立的学校迁到南阳地区，天津的颜料北隔黄河进不来，群众穿黑衣服利用坑中黑泥揉搓揉搓，黑不黑，灰不灰，白布用石榴皮，槐豆水染成土色。更成问题的是吃盐，尉氏北芦馆是新黄河渡口，由日本鬼子和皇协军把守，海盐禁运。

偶尔河西游击队（土匪武装美其名曰游击队）与皇协军勾结私运一些海盐，每斗小麦（15市斤）仅能换上三斤盐，最缺时只换一斤。群众利用含有硝盐的潮土，通过过滤熬晒，成为又涩又苦的硝盐，群众也叫做小盐。火柴都称之为洋火，更是买不到，用火链火石打火，有时连火石也买不到，每逢做饭，只要一户有火，大家都用破布作媒纸，互相点燃。洗衣服没有肥皂，用豆腐浆水和草木灰滤碱性水洗衣服。凡是日用品带有“洋”字的统统买不到，如洋油、洋布、洋线、洋钉，学生连买支铅笔都困难。到1942年又出现旱灾，大批农民纷纷西逃陕西省各县。特别是所谓由土匪组成的游击队驻扎的地方已是十室九空，人都逃活命去了。群众对这些既兵又匪的“游而不击的土驴”编成顺口溜：游击队，吃干队，黑了推牌九，白天蒙头睡，听说日本来，跑的丢了鞋……。

涪川第二次沦陷

1944年4月日寇南侵，消息传出，涪川城里大乱。这时我父亲和姐姐到叶县长途汽车站找我大哥，家中仅有我们母子二人，往那里跑毫无主意，毫无目的。就采取躲一时算一时的办法，想着日军总会退的。第一个地方出城到东关外，是街坊的一个亲戚家，我喊他表兄，他以赶脚驴为生。住有两天，约在4月22日或23日，日军的铁蹄踏进了涪川城。传出来消息说进城没有杀人，叫群众都到城隍庙门外开会。我跟在人群的后边也想看看，路上听说商界派的有代表维持。去到后见是新堂街的一个痞子在喊着人往前站。这个人的名子忘记了。他当过警察，干过自卫队，也摆过烟摊，让他来应酬支应日军。他和汉奸对话。一边站有十几个杀气腾腾的日寇。汉奸向日寇低头哈腰，他们要鸡子，要肉，要女人。我怕日寇抓人，没敢多停留就回东关了。

涪川沦陷以后，从开封、尉氏方向来的日军天天不断，住在城里的日寇也经常出来活动。此地不能久留，在敌人眼皮底下很危险。无奈，我们母子二人又逃到城东南小沙沃村。那里是我姑奶奶的女婿仝迷糊家，表姑家20来口人，开木作铺。她大哥技艺高超，能在膝盖上用手斧砍车耳，打的红头车载重七八百斤，坚固耐用。大侄子仝银恩，搪漆家具的浮雕、镂花尤为精通，是附近有名的细木匠。此人忠厚仗义，社交很广。在表姑家住了七八天。准备到石桥姐家住几天再回老家——陈寔故里。

不幸中的万幸

5月初的一天上午（农历前四月十二三），我们离开小沙沃到石桥村。去到以后他们又惊又喜，说这里也不太平，昨天日本马队来了，到处找人，折腾了半晌才走。我们说东藏西躲不是办法，准备回老家，我姐夫龙光说前几天把古桥的桥架通了，日军淌淌似水往南开，没有人敢去桥上（群众称古桥镇为桥上）赶集。说话不及，听到街上有马的嘶叫声，接着嗒嗒的马蹄声越听越响，我们很快躲进大门里的夹壁墙里（大门前边垒实，门中间有三四尺空隙）。约半小时以后，外边没有什么动静了才敢出来，回家的念头又打消了。感到石桥不是久留之地，还回小沙沃去。

我们不敢等到中午吃饭，便带了三四个馍出了北寨门，下午一点多钟回到小沙沃村，庄子大变样了，就在我们走后十点左右日寇七八辆装甲车进了村，有路不走，横冲直撞，把树木都撞断，树倒房塌，把一个小村搞得很惨。他们挨户搜查，抓鸡子逮猪，每户门上或墙上插上纸制的日本膏药旗，在中午日军离了村，现在在和尚桥新华路菜市场有一位小沙沃姓刘的（约60来岁）我问他日寇到您村记清记不清，他说：“记得，记不清。那时候小，只知道害怕，村上的大树都撞倒了。”我们离开了沙沃仅四五个小时，村上就遭到洗劫，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在这战乱年代，为逃难不仅连累了亲戚，万一出啥问题更不合适，他们百般阻拦，相劝，我们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了家。

硬地——程廷献

程廷献，生于1914年（卒于1991年），1944年洧川沦陷时刚30来岁，中等身材，膀大腰圆，十分壮实，生性倔犟，争胜好强，还好打个抱不平。因家穷，经常到陕西省的蒲城县下煤窑，打过短工，坐过汽车，搭过火车，算是在外闯荡见过世面的人。1944年刚转过年景他没有外出，四月二十七号有七个日军鬼子，进了我村，群众有的跑到村外，有的躲在家里。程廷献（按辈分他是族叔）没有跑，在日寇搜查中被抓住了，汉奸向他要东西，叫他找人，他说什么都没有，推推搡搡把他带到村东土地庙后，陈铁乾爬在墙头上偷看。见几个鬼子拳打脚踢，他躲闪中用力扛撞，接连撞到三个鬼子，日寇哇啦哇啦乱叫。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汉奸，跑到张家，找到一根喂牲

口的枣木拌草棍，边打边喊，喝令他跪下。他坚持不跪，鬼子把他捺倒，他爬起来，反复几次，最后日寇用棍子把他打晕倒在地上，残忍地向他身上乱打，直到不会说话才把棍子扔掉。日本鬼子走了以后乡亲们把他送回家中。因伤痛几天起不了床。群众知道他这样有骨气，至死不屈，因此，送了个绰号——硬地。

一场狗咬狗的闹剧

1944年4月下旬日寇进入洧川，原国民兵团部副团长许海峰（字子屿，团长由县长兼）投靠日寇当汉奸并任县保安团团长。县城平时只住七八个日军，有时三四个人，他们依靠汉奸维持会安靖地方。当时城乡社会秩序很乱，报私仇打黑枪的、土匪“起票”的不断发生，茶庵刘庄人马德，原为城厢镇的镇丁，土匪出身，利用当镇丁的身份，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日寇一来，投奔许海峰当走狗，暗地又和张立申、李小秀（均保安团的）与山东一个土匪勾结。马德知道许海峰到南席开会，计划待晚上回来时拦截枪支。当上午许海峰路过茶庵刘庄时，村头卖烟老头说有土匪正在马德家聚集，许令卫队进村围捕。山东土匪从窗户里开了枪，打死了卫兵张聚长，卫队在追击中打死了山东土匪，其他人逃脱。接着，大南街刘铁汉为霸占刘文星之妻，雇黑枪手把刘文星暗杀在城东蚂蚱庙。刘文星的表弟赵子明在许海峰手下当中队长，要求杀刘铁汉与表兄报仇。

事情闹到了许海峰头上。遂将马德、张立申（张庄人）、李小秀（乐关人）三个兵匪和有牵连的何金聚（英刘人）抓获，同时抓了刘铁汉。据传早晨刘在抹角楼前喝豆腐脑，有人对他说铁汉你出事了，快走吧，刘不以为然。随后抓住了仝录（东关人）、张金安（西街人）两个黑枪手。本来他们都是许的部下，相识相通的一丘之貉，许以正人君子出现，安靖地方为民除害为由，于农历五月初，在洧川东关外路北大杨树下活铡马德等七人。当铡刘铁汉时，刘提出要子屿来见面。日军同意请许海峰到场，许答复不见。刘铁汉高喊“许子屿不够朋友，来世再说。”遂被捺进铡口。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许海峰摇身一变成了“国军”，继任洧川县国民兵团部头把交椅。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秋人民政府将许海峰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重见光明 勿忘耻辱

1945年8月15日寇投降，9月中旬，洧川县政府决定中学复课，在一无桌凳、二无教师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教育科长于丙寅，是南席镇张子店人，国立河南大学毕业（建国后任教师，已退休），自兼校长，到处延聘教师，发动二三年级学生整理校园，筹备招收新生，创建师范班，成为一校两部（中学部、师范部），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竟在10月中旬敲响了学校的洪钟。老生新生，男生女生，自带桌凳被褥，带着印制或绣有“V”字（VictoI，第一个字母）的书包、手提包，扬眉吐气跨进学校大门。同学们一年多重见，欢喜若狂，整个校园沸腾起来了，那种兴奋的心情和愉快的场面，真是言语难以形容。

二十世纪的前半叶，是我的青少年时代，是战乱的时代，是中国科学不发达的时代，是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的时代。多少青少年没有安定的学习环境，多少青少年失去了学习的大好时机，多少青少年失去父母，多少青少年蓬头垢面离乡背井流浪于街头，望天长叹，是谁咎耶？历史功罪，应予评说。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仅此草草，权作纪念。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六日

（作者程廉清：长葛市粮食局干部，史志爱好者。）

长葛沦陷时期见闻

郑云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海上南北交通线被美军切断。日寇为了打通陆上南北交通线，挽救其南洋诸岛战争的败局，于1944年4月中旬发动了中原战役（也叫豫中战役）。日本调动了十余万兵力，在飞机、坦克和骑兵的配合下，向河南地区发动了猛烈进攻。国民党汤恩伯所属各部30余万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抗击作战，郑州、洛阳等四十多座城市相继失守，损失兵力五万余人，大半个河南省沦亡于日寇之手。现将长葛沦陷后日寇占领统治情况，仅我所见闻的片断实事回忆于下：

1944年4月17日晚，日军由中牟县城据点发动了渡河（新黄河）作战。十八日晨，国民党暂编第十五军驻守在中牟城外及两侧河防阵地相继失守。日军突破了中牟军队阵地后，兵分三路，分头向郑州、新郑、尉氏等地进犯。

我村在郑州人很多。全村十三座刨（刮）烟丝的作坊，有60%的农户在郑州贩卖烟丝，几乎每天都有从郑州往来的人，因此消息很灵通，天天有消息传来。说日军18日在中牟过河了，有的说，日军20日到郑州了，又有传说日军21日占领新郑县城了，22日又到了梨河镇。消息频频、众说纷纭，人心慌慌。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临，4月23日中午，国民党暂编十五军军部的后勤人员及家属约二百余人，由北边退下来，到我村蒋庄休息派饭吃。据军部人讲，日寇占领新郑后兵分两路南下向长葛县城（现老城）及和尚桥进犯。23日下午约五时左右，退守在和尚桥的十五军军部直属部队，便同来犯的日军接火交战。顿时，枪炮声如炸豆一样响成一片，到半夜枪声逐步由北向南转移，后半夜约二时许枪声逐渐稀少下来，十五军抵抗后向许昌方向撤退转移了。前半夜打得激烈时候，驻我村的十五军军部后勤人员及家属，一部分人在村里休息，一部分人带着武器牵着一只狼狗到村东头皂角树下，听枪声窥测动静。我们十几个青年也跟在一旁看热闹。约在晚十一点多钟，军部人员男男女女集合出村向南岗李、杜寨、许昌以西方向去了。当晚，日军占领和尚桥之后，和尚桥火光冲天，人们的哭叫声、狗咬声震惊附近各村，使老百姓十分恐慌。

4月24日（农历前四月初二日）天刚微明，和尚桥附近村庄的小李庄、胥庄、贺庄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拥进我们蒋庄村。天明后又分别向樊楼、张固店、中岳店等村西逃，找亲友逃灾躲难。我们蒋庄村距和尚桥仅六华里，虽未远逃，也跑到村南路沟里躲藏。那时国民党政府下令交通要道全挖成沟，以沟代路以路代掩体，抗击或阻挡日寇坦克、汽车通过，年轻人坐在高处，眺望和尚桥方向动静。夜晚家家产户都睡在麦田里，以防日寇夜晚来被捂进村里逃不出来。这种昼夜躲藏的生活先后延续个把月，到建立了维持会才结束。

在和尚桥及周围村上，没有逃出的人，有的被日军抓去当苦力，有的被杀掉，有的妇女被奸污。日军侵占和尚桥一个多月后，第一次到和尚桥赶集时，看到胥庄南地的东西道路上，路沟里以及马庄东地去禹县的公路上到处是死尸，成群的狗在争夺死尸吃，死尸腐烂臭气难闻。悲惨情景目不忍睹。

日军占领长葛后，在收麦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残暴的烧杀抢劫，老百姓东躲西逃，恐慌不安，社会一片混乱。日寇为稳定局势，于五月下旬收罗汉奸，建立维持会，当时长葛县的维持会会长是孔学范（山孔人），和尚桥镇的维持会会长是张昆信（木锨刘人）。

维持会成立后，老百姓都陆续回村安家，收割麦子。刚打完场，日本鬼子就下乡抢粮了，每队日本兵约二十多人可能是个分队，由汉奸翻译官带路到各村抢粮、拉猪、抓人、抓牲口、抓车辆，往和尚桥送粮、送猪。有一次汉奸带领一个分队的日本兵到我们蒋庄抢粮，先是日本兵集合在村南打麦场上，汉奸说：各家把粮和猪送到场上交给皇军，并派车送和尚桥。因头一次见日本兵，保长有些胆怯害怕，不敢出来接待、应酬日本兵。老百姓也躲得躲藏得藏。妇女都躲进了红薯窖里，没人敢出来送粮送猪。日本兵带队的军官大吼一声，日本兵便解散进村挨家搜查，翻箱倒柜、抢粮、拉猪、抓人、抓牲口、抓车，闹了一阵之后，装了十几牛车的粮食和猪就走了。从此以后，几乎是每月下乡进村抢劫一次。因第一次抢劫有教训，村民要求保长出面应酬，并推举几位胆大的又能说会道的中老年人协助保长应酬日本兵。以后每次日本鬼子来，村上按村民田地多少摊派，将准备好的粮、猪、白菜、萝卜等物，随日本兵用牛车送往和尚桥日本军营。

1944年9月又建立日伪政权，仍设在老县城，日本县政府指导官小林令宜，伪县长武俊甫（长葛人），伪县政府秘书长黄玉卿（湾张村人），和尚桥镇伪镇长仍是张昆信，樊楼乡的伪乡长朱恪尊（辛庄坡人），我们蒋庄村的伪保长郑仲林。

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进攻，在1938年扒黄河的同时将郑州以南的平汉铁路也扒掉了，铁轨枕木埋藏在铁路旁村庄里，路基铲平种上了庄稼。日军为迅速恢复陆上南北交通，于1944年6月上旬刚收罢麦，就令伪政府征派民工砍伐树木抢修平汉铁路。将全县的青壮年男子均征派出去编了十二个中队的民工团，团长胡伯乾（坡胡人），各乡镇的中队由乡队派任中队长，我们樊楼乡中队长是郑复生（外号勾头生—蒋庄人）。长葛民工负责由官亭车站至许昌车站这一段落的修建工程，在日军的监督鞭打下，民工们忍受着残酷的虐待和折磨。昼夜施工，经二十多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封路基、架桥（木桩桥）、铺轨的全部工程。我也被征参加了修复这段铁路的全部工程。在铁路两侧村庄寻找被埋藏的铁轨枕木时，日军由汉奸带着到各村找，老百姓都说不知道，日本兵则恼羞成怒，就在村上到处乱抓人，一抓到老百姓就进行吊打，逼迫老百姓交待出埋藏铁轨枕木的地址，有些有骨气的人被打死也不说。日本兵（当时驻扎韩庄、湾张等村）带铁锨在各村到处乱挖，最后把铁轨枕木挖出来运走了。又以老百姓不同皇军合作为由乱抓乱打老百姓，有的被抓去当苦工倍受残酷折磨。

再是对被征修铁路的民工，每人每天只发老秤十两东北高粱米，合现在新秤只有六两米，根本吃不饱，每天早上六点上工，晚上十二点才收工，民工们抬土挖土封路基，拉铁夯砸木桩修桥，背枕木，抬铁轨等十八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根本承受不了。民工们喝冷水买黄瓜吃，来垫补肚子，但出现拉肚子，民工们病了不准休息，还得继续带病劳动，稍微动作慢一点，就要挨日本兵的枪托、皮鞭及汉奸工头的棍子、树条。日本鬼子还骂人“八格牙鲁，苦力的不干活，坏坏的”，有的民工捎信家里带点干粮或买黄瓜其他小食凑空吃点充饥。但被日本兵看见了，一面吼叫“小小咪唏不要，干活完了统统的大大的咪唏”，“叭格牙鲁，坏坏的”。一面又是一顿枪托、鞭子乱打。民工们只有忍着饥饿，勒勒裤腰，掉着眼泪，续继去做笨重的体力劳动。民工们每天晚上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的觉，白天两顿饭，吃饭时休息半个小时，其余时间全是劳动做工。我们民工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挨打、挨骂、挨饿度过了二十多天，完成了修铁路工程。家里人几乎认不得了，因为每个人都瘦了很多，胡子头发都长长了。

铁路修通以后，在禹县以西、以北大山里，八路军游击队经常远距离奔袭，炸毁平汉铁路。日寇妄图防止八路军游击队袭击铁路运输，便招募了一批青壮年成立了护路队，分别在官亭、和尚桥、苏桥等车站各驻一个分队，沿铁路约每三华里建一草屋驻二班人，负责昼夜巡逻护路。同时，日军还经

常派装甲车在铁路上巡逻检查。铁路经常被炸断或扒掉，火车大翻身，日军的装甲车也慌忙沿路检查，追究护路队的责任，但往往是见护路队员被绳捆绑索绑在哨所里，查不出游击队来去线索。日军无可奈何，只有把气发泄在护路队员及沿路村庄老百姓身上，把护路队员打一顿，骂一顿，或关几天禁闭了事。有时到沿路村庄抓几个所谓可疑的老百姓乱打乱审一顿，如看到谁家放的有道钉或铁锥板钳之类的工具，就大做文章，把主人抓进和尚桥车站警务段吊打，追问同游击队的关系，当查不出线索事实时就罚款，令村里取保放人了事。尽管日本鬼子采取了一切残酷手段，但仍挡不住游击队对铁路运输的袭击破坏，使日寇永远不得安宁，铁路永远不能畅通。

日本军国主义者，1944年4月侵占长葛，9月伴随种麦时期就下令强迫老百姓每家都种植鸦片烟，由伪政府供应种子，有抗拒不种者罚款治罪。当时我家在村东菜园地里也种了一亩鸦片烟，第二年即1945年夏初收割麦子前收割鸦片烟，鸦片烟膏由伪政府廉价收去，又以高价在社会上卖给烟馆及烟民吸食。社会上已基本断绝了的烟馆烟民又死灰复燃。

日军占领时期，封建迷信活动猖獗，装神弄鬼、愚弄老百姓，骗取钱财。1944年秋正值闹蝗虫灾之际，我们蒋庄村伪保长郑仲林，奉日本人的指令，乘机回村兴办庙道，郑仲林胸前还佩带着日本人颁发的镌有“办道”二字的圆证章，洋洋得意、神气活现地在附近各村大肆发展庙道徒。日本投降后直到解放，郑仲林仍不务正业，继续信神弄鬼、装模作样，给人看病、算命、看阴阳宅，骗取钱财，后被群众管制。

与此同时，日本鬼子一副伪君子的和善面孔，利用标语、传单、漫画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老百姓进行欺骗宣传。如到处在墙壁上涂写“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王道乐土”等标语，美化日寇侵略中国的野心。传单上印着日本膏药旗及汪精卫政权的“中日亲善”。在老城西门大街的墙壁上画着一个粮仓，粮仓一旁有一老农民坐在小凳子上吸着旱烟，另一旁坐一位老太婆在逗着小孩玩耍，老太婆面前有一年轻妇女坐在纺车前纺棉纱。漫画上边用白石灰写了四个大字“王道乐土。”

以上仅是个人亲见亲闻，其详实情况还望亲历者补充，以启迪后人勿忘国耻家恨。

（作者郑云龙：长葛人。参加“保安三团”起义，起义后随军南下，参加过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的几次大的战役。）